

《字林西报》皖南事变报道及评论探析

吴 飞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抗战期间国共双方的冲突推上顶峰。在国共双方的官方报刊为此进行笔战的同时,国内商业媒体,尤其是有西方背景的英文商业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则不为大众所熟知。通过对上海《字林西报》涉及皖南事变的内容进行梳理,发现由于信息来源的限制,《字林西报》提供了共产党、新四军的一些消息,但仍较为倾向重庆政府。中共在一面反击日伪、一面反击亲日顽固派的两线斗争中颇为艰难。

关键词:《字林西报》;皖南事变;新闻框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4-0005-05

一、事情背景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冲突。目前,研究新闻媒体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报道较少,例如石史研究了《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宣传斗争^[1],石建国分析了《大公报》与《申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报道^[2]。姜飞梳理了皖南事变中《新中华报》的相关报道^[3],董莹研究了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及日伪方面报纸的报道^[4]。这些研究都以中文报刊的相关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而鲜有对外文报刊相关内容的研究。

本文拟就地处上海、代表在华英美人士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涉及皖南事变的报道、评论和读者来信等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以了解不同报刊对皖南事变及共产党的态度。《字林西报》由英国人创办于上海,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一定程度上代表英美方面人士的立场,并能影响到英美人士的态度。《字林西报》素有代表在华“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官报”之称。字林报业与英租界及此后的公共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支持和赞助^[5]。《字林西报》重视时政新闻和言论,有很强的政治性,经常就中外关

系、中国政局和其他时事问题发表意见。新闻以报道中国时事和外国人在华活动为主,也刊载世界各地的消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字林西报》“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近因经营有方,自建房屋,翼翼然为英人在东方之唯一言论机关矣”^[6]。

二、《字林西报》涉及皖南事变内容及分析

1940年后,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先后爆发的黄桥、曹甸等战役使得国共双方本就脆弱的互信愈加削弱。国民党军方“制裁”共产党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共高潮已是山雨欲来。在这样的背景下,1940年年底,重庆方面多次下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转移,而新四军方面则因种种原因难以迅速完成转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在叶挺、项英等带领下转移至皖南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小部分分散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是为“皖南事变”。本文梳理了1941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即皖南事变前后《字

林西报》相关新闻报道、转载评论和读者来信,其中新闻报道和转载评论 31 则,读者来信 3 则。

1. 《字林西报》对皖南事变的报道

1941 年 1 月 1 日的《字林西报》刊登了一则“新四军执行调令”的消息,但事实上,迟至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才离开皖南泾县云岭。1 月 6 日,《字林西报》刊载了《致蒋介石的新年消息:共产党军队领导人表达忠诚(New Year Message to Chiang Kai-shek: Communist Army Leaders Express Loyalty)》,而就在这条新闻发表的当日,双方的战斗业已打响。

1 月 19 日的《字林西报》以《南京附近不寻常的战斗:重庆和日本军队向共产党发起攻势(Unusual Fighting Near Nanking: Chungking and Japanese Troops Launch Attacks on Communists)》和《浙苏叛军被制服:重庆军采取军事行动兼并新四军(Chekiang-Kiangsu Rebels Overcome: Chungking Troops Adopt Military Measures; Absorb Fourth Red Army)》为题报道了皖南发生的战斗。其采用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些说法,如皖南事变由新四军主动挑起,又如称新四军为“叛军(rebels)”。值得注意的是,《字林西报》披露了一些重庆当局与日本、汪伪勾结进攻新四军的信息。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一度考虑武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曾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的指示。陕北、华北、华中的重庆当局部队都曾成为中共反击计划的目标。1 月 27 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共产党威胁陕西(Communist Threat Seen in Shensi)》,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紧张局势,声称延安已经下达了反击的命令。但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中共当时的实力不足以与重庆当局全面分裂,而军事反攻也不利于团结中间力量,因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军事反攻计划最终被放弃。

1 月 27 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题为《整饬军纪加强抗战》的演讲。蒋介石声称,处罚抗命违纪军队,只为整饬军纪,并无政治党派性质,必须彻底执行纪律。蒋介石将新四军与韩复榘、石友三等抗战不力且不遵守命令的军阀相提并论,表示“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1 月 30 日的《字林西报》即以《蒋介石谴责新四军事件(Chiang Kai-shek Belittles Fourth Army Trouble)》为题报道了蒋介石的演讲,同时报道了蒋介石的演讲得到了除《新华日报》以外的中国媒体

的拥护。但同时《字林西报》也提及了新四军主力并不在皖南,且已经重建组织。

2 月 3 日的《字林西报》以《重庆自信与中共的问题不严重(Chungking Confident Trouble With Reds Not Serious)》为题报道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的磋商,提及了重庆方面坚持军纪重于一切及皖南事变不涉及党派之争的强硬立场,而对中共方面的要求则只字未提。

西方世界对皖南事变后中国能否坚持抗战而不至于发生内讧颇为关心。2 月 7 号和 8 号,《字林西报》先后转载了在美国的宋子文和胡适的谈话,两人都表达了对战胜日本的信心和对国共之间不会爆发内战的乐观,以示对西方焦虑情绪的安抚。

相比美英对蒋介石的支持,苏联则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蒋介石及重庆当局的不满。2 月 11 日的《字林西报》刊登了《据传苏联在华顾问离境(Soviet Advisors to China Said Leaving)》的新闻,这条日本同盟社的消息声称在华的 40 名苏联顾问中有 26 名回国,且重庆当局对新四军的镇压引起了敌后游击队的不满,有游击队人员向南京方面投降。《字林西报》还刊登了重庆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其宣称共产党军队遵守了重庆方面的命令,并且共产党部队只占据全部国家军队中的 2% 且完全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前,苏联方面并没有撤回在华顾问和军事人员一事的记载,苏联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也在平衡国共之间的关系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造成的国共之间的纷争使得一部分立场不坚定者选择向顽固派妥协或投靠日本。1 月 29 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 15 名青年共产党党员退党的消息,第二天的报纸又刊登了类似的消息。2 月 11 日的《字林西报》刊登了一则驻芜湖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冲突后投降日本的短消息。而在当月,原国民党鲁苏皖游击以副总指挥李长江公开率部投敌。其卖国求荣的行为遭到了爱国军民的强烈谴责,新四军当即决定对其进行讨伐。而 2 月 21 日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了李长江投敌的同时也声称其与皖南事变后北撤进入江苏的新四军展开了激战。

而国共之间的僵局也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担忧。湖南、广东省议会致信毛泽东,呼吁共产党信守对重庆政府的忠诚和对蒋介石命令的遵守,

避免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字林西报》在2月底分别刊登了这些消息。

皖南事变后,面对重庆方面“撤销”新四军番号、“解散”新四军的举动,中共中央在1月20日下令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任命了新的指挥员。3月1日的《字林西报》以《共产党任命自己的指挥官(Communists Appoint Own Commander)》为标题报道了中共对新四军新任领导人的任命和周恩来在重庆与当局周旋的情况。

皖南事变后,中共方面提出了十二项要求,后又提出了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并以此作为出席1941年3月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的前提条件。国民参政会由此成为国共冲突的新战场。《字林西报》在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也发表了一些报道。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代表共产党的七位参政员并未出现在会场。在开幕式上,蒋介石发表了《抗战的新形势与全国努力的方向》的演讲。蒋介石声称国民党“本身绝无党派成见可言”,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国防绝对安全。3月3日的《字林西报》也以《中国的战争目标被确定(China's War Aims Defined)》为题报道了蒋介石的演讲,但对其所谓“绝无党派成见可言”的言论则并未涉及。

面对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国民参政会提出了缓和国共冲突的方案,包括选举一名共产党代表进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这是中共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之一)以及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共之间的分歧并提出解决方案。3月6日的《字林西报》以《解决重庆与中共近期冲突的方案(Solutions to Chungking Communist Rift Near)》披露了这一决议。

3月8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国民参政会上的国共僵局。参政会决议声称一切问题“除有关军令军纪者外,在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下,当无不可提付本会讨论,并依本会之议决,以促政府之实行”。这一决议仍然离共产党的要求甚远,因而并不能获得共产党的响应。

在中共与重庆当局仍然僵持不下的情况下,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做了《对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会议之立场与态度》的报告。蒋介石声称重庆政府对中共的态度“始终是委曲求全,以期团结御侮,达到我们抗战建国最后成功的目的”。蒋介石将中共方面的要求分为军事、政

治、党派三部分,表示在军事上重庆政府一贯的精神就是“军队国家化”,绝不能有第二个私党私人的军队系统;在政治上要使政治“民主化”,但“政权只有一个”;就党派方面在国民参政会上应只有“国民的立场”而没有“党派的立场”。蒋介石宣称,只要中共“能够幡然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不将第十八集团军当作他一党私有的军队,不利用其来牵制友军,妨碍抗战”,履行抗战爆发时的承诺,就能早日赢得抗战胜利。蒋介石最后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3月9日的《字林西报》以《蒋介石解释与中共的冲突(Gen. Chiang Gives Explanation of Trouble with Communists)》报道了蒋介石的这一声明。

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希望得到美英的援助,3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给予蒋介石和重庆当局重要支持。3月16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罗斯福谈论对华援助(Roosevelt Speaks on Aid to China)》。罗斯福表示并不在意美国援华物资是否被用于与中共作战。这则来自日本同盟社的消息给了陷入皖南事变困境的蒋介石以极大的支持。

不少国内外媒体与知名人士也对皖南事变发表了看法。《字林西报》转载其他媒体的评论也采用新闻报道的形式进行解读,因而在下列研究中将其归入新闻类别。

1月22日的《字林西报》刊登了重庆《大公报》发表《关于新四军事件》社论的新闻。在这一评论中,《大公报》声称“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表明了对“军队国家化”的支持,但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共西安事变以来坚守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的认可,并呼吁重庆政府宽大处理叶挺及新四军。1月29日的《字林西报》转载了苏联《真理报(Pravda)》关于皖南事变的评论。《真理报》谴责了国共之间的冲突,认为这将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并警告了中国面临内战的风险。

2月3日的《字林西报》转载了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蒋介石与共产党的争端备受关注》评论。这篇评论揭露了国民党人中普遍的视日本为疥癣之疾、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心理,但也表达了相信蒋介石能够解决问题的态度。

3月10日的《字林西报》刊登了两则读者来信。第一封署名S·T·Roberts的读者写信就解

决国共冲突提出了自己希望国共双方能够和平且永久解决其争端的建议,以保障远东同盟国抵抗轴心国的胜利。第二封署名 F. D. Z. 的读者来信则以在重庆的共产党报纸不能就皖南事变发表意见为引子,谈到了以在重庆的亲人因在私人通信中批评重庆当局而被扣押下落不明一事,表达了希望重庆当局能公正且怜悯地处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不同的声音的愿望。

《字林西报》在 3 月 13 日转载了路透社的《中共与重庆的冲突言过其实(Communist-Chungking Split Exaggerated)》。这篇文章指出,国共之间的冲突在抗战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 1927 年两党的决裂。尽管重庆当局试图和平解决双方争端,但中共建立自己的强大武装和政治控制乃至最终夺取中央政权的决心不会改变,而双方的冲突也会继续进行下去。当天的《字林西报》还刊登了一封署名 Y · F · Chen 的读者来信,作者是一名政治系的学生,其表达了对国民党重兵防御共产党的不满及希望事件能和平解决的愿望。

3 月 13 日的《字林西报》还发表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关于国共冲突的评论。这篇文章赞赏了共产党过往抗战的功绩,但也提及了共产党建立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这篇评论认为,美国不应援助中国的内战,而当中国在美国援助下击败日本后,双方领导人会和平解决分歧。

随着时间推移和抗战战局的不断变化,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论也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字林西报》的内容回归了对世界各地战局的报道而甚少讨论国共之争。

2. 关于皖南事变报道新闻材料的选择

分析 31 篇《字林西报》皖南事变报道及转载评论,发现相关报道大部分来自以路透社为代表的英美通讯社,兼有一部分来自日本同盟社,几乎不采用中国、苏联等国家的报刊和通讯社的报道。其主要转载信息来源如表 1、表 2 所示:

作为一家英文媒体,《字林西报》较为依赖英美等英语国家媒体的报道,同时也能看出日本为粉饰其侵华行径而加强新闻与宣传力度、争夺话语权的努力。相比而言,中国、苏联等国家的话语权则比较微弱。

《字林西报》多采用英美通讯社的报道,而在战争背景下,这些通讯社在华的采访活动大多随国民政府集中在大后方,因而从重庆发稿的新闻

内容数量远多于其他地区,重庆成为当时中国的新闻中心。这也有利于重庆国民党当局对外宣扬其观点。新闻源控制和新闻检查是重庆当局战时新闻统制政策影响媒体生产的重要方面,而新闻源控制正是依托中央社完成^[8]。除重庆之外,在当时尚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香港和美国的华盛顿、纽约也成为重要的新闻发稿地。相比而言,敌后根据地对外传播的力度则不及其他地区,也鲜有西方通讯社记者前往根据地采访。不同的通讯社发稿地点也有所差异。发自重庆的稿件几乎都来自路透社,而日本背景的同盟社则多从香港或南京发布消息。

表 1 《字林西报》皖南事变报道新闻来源
Table 1 News sources of reports related to South Anhui Incident 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消息来源	消息数量
路透社(Reuters)	15
同盟社(Domei)	5
合众社(United Press)	3
哈瓦斯社(Havas)	1
正言报(Cheng Yan Pao)	1
National Herald	1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1
未注明	4

表 2 《字林西报》皖南事变相关内容发稿地点
Table 2 Locations of publication of reports related to South Anhui Incident 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地点	数量
重庆	14
香港	3
华盛顿	3
纽约	3
南京	2
莫斯科	1
未注明	5

3. 皖南事变报道新闻材料的建构

《字林西报》的头版消息多为欧洲战场的战况。在以上 31 篇报道中,只有《共产党威胁陕西(Communist Threat Seen in Shensi)》《重庆自信与中共的问题不严重(Chungking Confident Trouble With Reds Not Serious)》《解决重庆与中共近期冲突的方案(Solutions to Chungking Communist Rift Near)》这三篇报道被安排在了头版消息的位置。同时《字林西报》并非每天都有皖南事变相关消

息刊载。这31篇报道中,1月29日、1月30日和2月11日相关报道数目最多,均为3篇;其次为1月19日、2月3日、2月8日和3月13日,均发表了2篇相关报道。多篇报道与事变的时间节点相吻合,如1月19日恰逢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官方报道之后,1月29日至30日则恰逢蒋介石为其积极反共行为辩解,3月13日则正逢国民参政会闭幕。对于英美在华人士而言,日本并未对英美等国家宣战,中国战场,尤其是国共之间的冲突在当时并非其主要关注的热点,因而皖南事变相关消息的重要性也不及当时危机重重的欧洲局势。

《字林西报》皖南事变的报道主要展现冲突主题。在31篇报道中,有2篇为一句话新闻,分别是新四军执行调令和叶挺被押往重庆这两则新闻。其他报道体裁多为通讯。

《字林西报》报道皖南事变多采用了国民党方面的说法。例如事变发生之后发表的《浙苏叛军被制服:重庆军采取军事行动兼并新四军(Chekiang-Kiangsu Rebels Overcome; Chunking Troops Adopt Military Measures; Absorb Fourth Red Army)》报道就采用的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叛乱”的诬蔑之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深入敌后的共产党缺少有效向海外发声的途径。日本同盟社的报道侧重于渲染放大国共之间的冲突,例如前述的苏联撤回军事顾问、国民党军队的投敌、新四军计划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击、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等内容皆出自同盟社之手。这些消息或真或假,体现了日本希望借皖南事变削弱抗战力量的野心。但总体而言,英美势力并未卷入当时国共之间的

冲突,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并不乐见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爆发内战,因而《字林西报》对皖南事变的呈现较为中立,并未完全偏向事变中的某一方。

三、结语

纵观皖南事变期间《字林西报》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出,在当时条件下即使是著名的商业大报,自采新闻,尤其是前往前线实地探访也并非易事,这涉及媒体生产成本及政府规制问题。采用官方通讯社的通稿是商业大报的习惯选择。从新闻选择的角度而言《字林西报》所引用的消息的信源以英美、日本的通讯社为主,没有来自共产党及其官方媒体,也没有重庆国民党当局及其官方媒体。

就《字林西报》涉及皖南事变的内容的建构而言,其并未“谴责”国民党及重庆当局,也并未明确表达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身处上海的《字林西报》作为英美人士的代言人对中国政局总体持中立态度。《字林西报》接受了重庆当局称新四军为“叛军(Rebels)”的说法,但同时刊登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消息(例如中共策划军事反击顽固派和新四军重建军部),也转载了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评论和读者来信。

总而言之,皖南事变后各方的舆论斗争的激烈,这从《字林西报》皖南事变相关内容的框架中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执政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尽管得到了一些报刊的同情,但无法改变在国内舆论界的弱势,在不利的环境中一面抵抗日伪,一面应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在不断的斗争和宣传中逐渐赢得舆论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 [1] 石史.《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的宣传斗争[J].新闻研究资料,1992(2):216-220.
- [2] 石建国.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大公报》《申报》有关报道评析[J].抗日战争研究,1998(3):131-146.
- [3] 姜飞.皖南事变中的《新中华报》[J].新闻大学,2000(2):57-61.
- [4] 董莹.国共和日伪报刊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14-126.
- [5] 汪幼海.《字林西报》与近代上海新闻事业[J].史林,2006(1):78-82.
- [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1:75.
- [7] 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4):54-65.
- [8] 曹立新.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4-154.